

同文馆·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

Mc
Graw
Hill

Education

简明新全球史

Traditions &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Jerry H. Bentley, Herbert F. Ziegler, and Heather E. Streets

〔美〕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希瑟·斯特里兹 著 魏凤莲 译



Mc
Graw
Hill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

Mc
Graw
Hill Education

简明新全球史

Traditions &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Jerry H. Bentley, Herbert F. Ziegler, and Heather E. Streets

〔美〕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希瑟·斯特里兹 著 魏凤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8-11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新全球史 / (美) 本特利等著; 魏凤莲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同文馆·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

ISBN 978-7-301-14784-9

I. 简… II. ①本…②魏… III. 世界史—普及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900 号

Jerry H. Bentley, Herbert F. Ziegler, Heather E. Streets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ISBN: 978-0-07-353453-4

Copyright © 2008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亚洲)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简明新全球史

著作责任者: [美] 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希瑟·斯特里兹 著 魏凤莲 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张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784-9/K·05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mm 16 开本 55 印张 845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言



一 何谓全球史？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 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 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 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 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其影响也越出美国, 走向世界。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 亦即“把全球化历史化, 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 就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趋势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正面效应是造成世界范围内空前广泛的经济合作, 使全球资源的生产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负面效应则是国家之间在接触中产生的不和谐, 这种不和谐包含经济摩擦, 但更为严重的是文化矛盾, 即在全球化浪潮面前, 经济落后地区的本土文化认同感面临危机, 而这种危机感反过来威胁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在这种形势下, 人们, 首先是西方人, 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 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从人类历史中寻找解决冲突的智慧。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 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 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 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 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旨趣。全球史学家认为, 书写全球史必须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对西方学者而言, 特别是要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近半个世纪以来, 伴随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的扩大, 西方史学家有关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传统结论越来越多地暴露其偏见性质, 全球史学家在反省之后指出, 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 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 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 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 “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二 全球史观由何而来？

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是互动 (interaction)，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用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曼宁教授的话来说，全球史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

要说明“互动”理念的意义，有必要追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演变过程。西方哲学素有探讨人类命运的传统，既以人类整体为对象，空间便无远弗届，时间便纵贯古今，因此西方最早的世界历史观念包含在哲学之中，具有探究规律性“发展模式”的特点。1500年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世界渐次在西人面前展开，西方的世界历史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对世界的征服同步，所以他们的世界历史观浸透征服者的优越感。他们以世界“主导者”自居，把扩张美化为“传播文化”，为世界发展历程勾画了一个“主导—传播模式”(pattern of dominance and diffusion)，即西方文化向世界播撒的模式。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不是宣布世界历史走向越来越接近西方古典标准，就是声称世界的发展过程将是福音书的传播和兑现过程。启蒙运动以后，宗教信仰式微，“主导—传播”理论变形为“种族优越论”，自称承继雅利安人(Aryan)、闪米特人(Semites)和含米特人(Hametes)血统的欧洲人，宣称只有他们这种不断进化的种族才有历史可言，其他种族因“停滞不前”根本没有历史。19世纪下半叶的文化进化论者，更为欧洲的种族优势加以“文化包装”。他们说，民族的高下决定于由知识、制度和技术构成的文化性质，欧洲人正是凭借文化特征赢得了优等民族的地位。于是，“进化种族”的“文化进步”过程成为欧洲人阐释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进入20世纪，在“优秀民族”内部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以亚洲人胜利而告终的结局冲击了欧洲种族、文化优越的神话，“主导—传播”的主体又从种族迁移到文明。以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论者提出，文化的精髓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价值观念，因此应据价值观念区分文明。尽管这些人承认各种文明的相对价值，也承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相似性，但他们对各文明兴衰过程的陈述，却使西方人得出只有西方文明才代表“自由、民主和理性”的结论。上个世纪初期，美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西方文明史”，作为美国学生了解“美国以外的世界”的唯一一门历史课程，说明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仍是“西方化”。上个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开展，美国流行用“现代化模式”解读世界历史。但这种“现代化模式”不过是“西方化模式”的延伸，因为论者把世界现代化的启动无论归结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还是归结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科学思维，或是归结为西欧中世纪的市场经济，都无非为“世界以西方为主导”提供新的注解。

西方世界历史观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两个方法论特点。第一，受近代生物学分类法和进化论的影响，习惯于将世界分为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明，并据其“进步”

程度分为不同等级。第二，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和阐述的基本单位。这两个方法论支点，使以西方为中心的“主导—传播模式”直至今天影响犹存。

但是自上个世纪末叶起，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观受到严重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时代变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空前频繁，包括种族、民族和国家在内的各种人类关系不断重组，全球经济互相关联，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借鉴与影响日趋明显，而破解诸如环境、生态之类的时代课题又迫切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与行动。于是人们怀疑建立在“分类法”基础之上的国别史或文明史研究是否真正能够对世界历史作出正确而全面的解释，是否真正能够为人类解决当代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

西方的后现代思潮解构了启蒙思想的“神话”，所谓“进步性”本身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既已失去根基，非西方文明便获得与西方文明同等的“意义”，建立在“文化进化论”基础上的“主导—传播模式”自然也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

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对西方传统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经典结论”也形成冲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各领域的研究都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的孤立、静止状态，而且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关联性”备受关注，西方世界史传统理论忽略不同地区、国家和文明之间“关联性”的缺陷突显出来。晚近遗传学研究证明，全人类同属一个“夏娃”的后代，同属一个本体，“种族”、“民族”等人为建构的概念并非客观存在，优劣之分实属臆想，基于“西方人种及其文化优势”的“西方中心主义”更显荒诞。西方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直接颠覆了某些传统结论。人类学家指出，自古以来，各种形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都处在不同形式的交往之中，并在交往中实现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双重融合，因此把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做为纯而又纯的“地方现象”来研究都不妥当。现代化研究中的依附理论则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以特定世界环境为条件，忽略这一环境，单纯从西方国家内部挖掘现代化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模式”，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中，将误导发展中国家。

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不仅学术界和理论界，而且整个社会都感受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贫困”。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以不同形式参与国际贸易或国际事务的中产阶级越来越不满足于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而他们系统了解世界历史的愿望又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理论与实际脱节，大学里的历史专业日渐萧条，历史学毕业生求职越来越困难，以致美国全球史开拓者之一麦克尼尔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我们的教授继续一味从事微观的区域性研究，将思想封闭在一个窄小范围之内，我们的历史课堂终有一天会变得空空荡荡。”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提出，应开创一种“以全球为一体”的史学，其宗旨是说明人类同属一个种，经历同一的历史，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其方法，是综合考察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运行机制的统一性，说明文明、民族或国家等不同形态的人类组织在

全球这一“动态交往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其本质，是继承西方史学以“模式”框架解释世界历史的传统，用“互动模式”取代“主导—传播模式”。

全球史学家之所以把“互动”作为建构世界历史的基础，首先因为他们认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他们认为，任何人类社会组织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他们必然存在于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彼此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或网络，并在该体系或网络内部相互影响。麦克尼尔特别指出，这种体系或网络与所谓“文明”并无对应关系。他说，文明的经典定义是“一种共有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在人们所说的各种文明内部都存在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而从外部来看，在文明与文明之间接触不可避免，有时甚至遵守相同的行为准则和商业规范，所以把人类切割为不同文明并不反映人类生活实际，用以解释世界历史更难自圆其说。

其次，全球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全球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他们说，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正因为如此，全球史学家主张，历史学家应对不同文化的“相遇”(encounter)保持足够的敏感。

三 全球史新在何处？

40余年来，全球史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甫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势必过度强调民族或文化的独特性和排他性，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宣扬的“对于优秀文化而言，越出国界的交流有害无益”的观点就是一个证明。（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第123页）全球史学者指

出，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史范式存在三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界”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三是淡化甚至抹煞了人类文明的共性，女性地位等具有普世性的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说明。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 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指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

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同西方近代历史科学一起诞生的。受进化论影响，西方近代史学以不断“发展”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而他们基于对文艺复兴以后世界变局的片面认识，认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其他地区则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只有欧洲国家的历史才属于史学范畴，对中国、印度、波斯等“停滞文明”的研究属于东方学，对“为开化”的非洲和澳洲的研究则属于人类学。进入 20 世纪以后，马克斯·韦伯奠基的西方发展模式理论和以布莱克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家，把欧洲发展模式树为“理想模型”，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欧洲中心论”。不应否认，在西方学术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同样由来已久，其中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些做法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查克拉巴迪 (Dipish Chakrabarty) 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迪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第五，重新审视地区史和国别史。全球史学者并非只做宏观研究，相反，他们中许多人

的研究专题是地区史和国别史，只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他们的研究范式与过去的地区国别史研究截然不同。全球史学者研究时，总是把某个地区或国别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考察，在这里“更大的空间范围”并不意味着像传统做法那样，仅是在进入“正题”之前简单交代一下“国际背景”，而是以阐述“小地方与大世界双向反射”为宗旨，既强调局部地区（“小地方”）的发展乃是与之关联的外部世界（“大世界”）变迁的结果，又要指出局部地区的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每一部地区国别史都可以同时作为一部世界史。上个世纪末，一些美国史学家提出运用“全球史观”重新书写美国历史，引起巨大反响，并形成“美国史全球化（Globalizing American History）运动”。参与这一“运动”的史学家认为，约自1500年开始，全世界只存在一种历史，即全球史，脱离全球运动奢谈“美国例外论”，纯属蛙见。他们指出，美国的历史不能从建国算起，不能从北美殖民算起，甚至不能从哥伦布登陆美洲算起，而应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欧洲形成的探险精神和11—14世纪沟通欧、亚、非三州的贸易网络，从这一高度宏观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特殊性”只是“变异”而非“例外”。

全球史作为对以国家为单元的传统世界史体系的突破，最初表现为多种阐释方法和审视角度，其中既包括环境史、瘟疫史、语言传播史等“超政治现象”研究，也包括妇女史、移民史等普世性描述，更包括跨国贸易、商业网络、比较政治等“跨国境”的专题研究。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史的指向渐渐集中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connection），而本书作者本特利恰恰是对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率先提出“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的命题，指出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无论如何是独立存在的，然而独立不等于封闭，不同文化的独立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是并存的，而全球史既以解读全球发展为使命，其中心任务即在探讨“独立”与“交往”的关系。本特利认为，“互动”是这一关系的本质。“互动”与“关联”不同，“关联”是客观存在，“互动”则含有主观努力的色彩，所以毋宁说，本特利所追求的不是描述地区间存在联系的事实，而是探讨造成这种联系的机制，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基于这种认识，本特利成为将西方传统文明史体系与当代全球史观成功“嫁接”的第一人。他的成名作《古代世界交往史》（*Old World Encounters*, 1993）和他主持编纂的教材《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by Jerry H. Bentley and Herbert Ziegler, 2002）沿用了将世界划分为不同文明的历史编纂法，但是他的着力点并不在于描述各种文明的兴衰，而在于说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各个文明的变型。

在说明互动机制方面，本特利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与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跨地区技术传播和病毒传播相比，文化传播所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都持顽强抵制态度，主动推进文化融合的事例在历史上虽然并非没有，但毕竟罕见。本特利

认为，虽然文化传播的总趋势是核心文化从文明中心向外扩散，但扩散过程相当缓慢，而且在扩散过程中原有的核心文化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第二，全球运动的总趋势表现为互为因果的三点：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具体说来就是：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中因种种原因而不断迁徙，逐渐遍布于地球上几乎所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形成过近千个社会和文化体系，组成并重组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商业和交流网络，创造了多种互相借力、互相利用的方式，并造成物种、技术、理念的传播，传播的结果是提升人类的繁衍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造成人口总量增加，而人口增长又将导致交流的数量和质量在更高层次的轮回。本特利的这些富有创意的观点得到全球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他为全球史所规定的移民、社会发展、商业、帝国主义、生物交换、文化融合等主题，也越来越成为全球史学者集中探讨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他撰写的教材被视为将全球史观运用于通史编纂的成功尝试之一，他本人也进入当代全球史少数代表人物之列。

四 如何看待全球史？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 21 世纪之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 80 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

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8年11月修订于北京

致 谢



xxiv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人无私的帮助，在这里，谨向这些人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为这本书所写的评论、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特别感谢麦格劳—希尔公司的编辑和出版队伍：Lyn Uhl, Jon-David Hague, Angela Kao, Lisa Pinto, Christina Gimlin, Kim Menning, Brian Pecko 等人，涉及编写一部世界历史都会遇到的内容、风格和结构等大量的问题，他们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帮我们克服了诸多难题。

最后，我们也对曾经阅读过本书的初稿和前几个版本并提出良好建议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这些人包括：

Heather J. Abdelnur
Blackburn College

Wayne Ackerson
Salisbury University

William H. Alexander
Norfolk State University

Michael Balyo
Chemeketa Community College

Diane Barefoot
*Caldwell Community College,
Watauga Campus*

Gene Barnett
Calhoun Community College

John Boswell
San Antonio College

W. H. Bragg
Georgia College and State University

Robert Brown
UNC Pembroke

Gayle Brunell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Marybeth Carlson
University of Dayton

Kay J. Carr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Jon Davidann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Mitch Driebe
Andrew College

Shannon Duffy
Loyola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Shawn Dry
Oakland Community College

Robert J. Flynn
Portland Community College

Deanna D. Forsman
North Hennepin Community College

Kristine Fredericks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James Fuller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Jessie Ruth Gast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George W. Gawrych
Baylor University

Deborah Gerish

Emporia State University
Gary G. Gibbs
Roanoke College
Candace Gregor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Jillian Hartley
Arkansas Northeastern College
Gregory Havrilcsak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lint
John K. Hayden
Southwest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Thomas J. Hegarty
University of Tampa
Michael Hickey
Bloomsburg University
Tamara Hun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ndiana
Wallace Hutcheon
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
Karen Irizarry
Southwestern College
Christopher Johnson
Palomar College
Roger L. Jungmey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arole A. Keller
San Antonio College
Charles Keller
Southern Arkansas University
Mee-Ae Kim
Albertson College of Idaho
Mark Konnerty
University of Calgary
Alan D. Lane
Barton College
Marcus Larse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Laurence W. Marvin
*Evans School of Humanities,
Berry College*
Ken Millen-Penn
Fairmont State University

April Najjaj
Greensboro College
Kenneth Osgood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Patrick Peeble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Kansas City
Phyllis E. Pobst
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
Ronald E. Powaski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Dave Pretty
Winthrop University
Tracie Provost
Middle Georgia College
Paul C. Rosier
Villanova University
Margaret Sankey
Minnesota State Moorhead
Daniel Sarefield
Ohio State University
Thomas Saylor
Concordia University, St. Paul
Stuart Schaar
Brooklyn College
Timothy Schroer
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
Francis M. Stackenwalt
East Central University
Gordon C. Thomasson
Broome Community College
John Tucker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Sara Tucker
Washburn University
Wendy Turner
August State University
David Ulbrich
Ball State University
Rick Whisonant
York Technical College
Pingchao Zhu
University of Idaho

前言



xix 如何使理解人类的整体历史成为可能？

研究世界历史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事业，因为它为我们在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理解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由于人类的复杂多样性，研究世界历史也遇到了令人生畏的挑战。人类社会曾采取了形态各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为今天留下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宗教和哲学遗产。

我们写作《新全球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过去的历史提供一种全球的观点——这是一种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来说，较为适合并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观念。今天，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交往，在这样一个时代，全球史观已经成为那些有见识、有责任感的人理解问题的基本工具。因为全球的互动深刻地影响到所有人的命运，仅仅从西欧、美国、日本或者其他某个社会出发，是不可能理解当代世界的。同样，仅仅从某个社会的历史经验出发也是不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的。

我们写作这本《简明新全球史》的目的是为了给教师提供一种选择，使他们在为学生介绍全球史观时有一种较为简便的教材，在讲述精彩的世界历史故事时有更为灵活的方式。

当然，简明本肯定不是以简短为目的，它也必须要有好的组织结构、能为解释历史提供系统性框架的有力的主题、引人入胜的叙述、富有吸引力的图片和牢固的基础知识，而这些因素都是《简明新全球史》的特色。

• 组织结构

我们把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按时间顺序来讨论世界的发展。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阶段，在本书中是七个连续的部分，代表着紧密联系的几个历史时期，组建了世界历史的大框架。这些时代具有一定的内聚力和连贯性主要应归因于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是这些网络把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结构使我们能做跨文化比较，帮助学生构建世界历史构架，从一种更可理解的观念出发安排历史事件。

• 统一的主题

本书的两大主题“传统”(traditions)和“交流”(encounters)关注了人类的历史。它们共同探讨了绝大多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传统”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的动态。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人群中就产生了特点各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来管理社会事务。某些传统出现和消失得相对较快，而另外一些传统则影响人类达百年、千年之久，有些甚至传至今日。

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开始，人们就有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交流”，则关注把个体社会与周围和更广大世界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无论是大规模的迁移、传染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远距离贸易，还是人们交往的其他多种方式，社会之间的交流都深刻地影响了个体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世界整体的发展。

与结构一样，有力的主题也为学生阐明了历史事件，提高了他们理解和评价世界历史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观点应用到在生活中发生的世界事件上。

• 引人入胜的叙述

本书的结构和主题为栩栩如生地讲述全球历史故事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每一章的开篇都讲述了一个处于运动和交流潮流中的人物的故事。这个人或者是玄奘，他是到印度学习佛教并把佛教经典带回中国的僧人；或者是女奴多娜·玛丽娜，她是墨西哥中部的贵族后裔，在科尔特斯征服她的祖国的过程中，她是他的翻译和助手。每一个故事都为学生学习世界历史打开了一扇门，增强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 富有吸引力的图片

全书的插图与叙述相辅相成，有助于历史故事在“传统”和“交流”的主题下展开。对玄奘感兴趣的学生可以看到描绘玄奘返回中国时的画卷，玄奘带回的马队驮着 657 本典籍和圣物、雕像等物。

在第 22 章里还描绘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多娜·玛丽娜站在科尔特斯和特拉斯卡拉的统治者中间，这两个人正在建立反对阿兹特克人的联盟。书中所有的插图都是经过仔细研究和挑选的，对故事的叙述起到了很好的说明作用。

书中的每一幅地图也有明确的教育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互动地图通过书中提供的网址可以找到。

• 牢固的基础知识

本书还有很多工具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历史，提高他们学习历史的热情。

每一部分的开篇都概括性地对一个主要历史时代进行解释，所有部分的开篇合在一起为七个时代和全书的解释框架提供了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总结。

xxii

每章开篇的人物小故事吸引学生进入更宏大的故事，使他们牢记世界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

历史文献是原始文献摘录，每一章中都有。这些摘录是为了说明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了解前人的观点和看法。

页边的关键词突出了文字叙述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和概念。

xxiii

大事年表在每一章的结尾处，列出了这一章的大事件和关键的年代，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概观。

每一章结尾处都有一段清晰的总结，提醒读者刚才读到的重点问题。

最后，进一步阅读文献提供了参考文献目录，学生在自学时可以使用这些参考书。

这本书是以《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英文第三版为基础简化编写的。众多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让我们受益良多。我们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以及在书中的写作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磨炼，很多人也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我们希望这种对话仍能通过《简明新全球史》继续下去，让我们的方法也能得到发展。本书三位作者都钟情于世界史，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受到今天的学生的欢迎，也能在学术界得到持久的欣赏。